

父母的心思

□邓刚

整天拉车推磨遭罪！因为老祖宗明白，人的灵魂是轮回的，活了这一辈子，还能过渡到下一辈子呀。像你这么勤劳艰难的一生，下一辈子会是个享福人啊！”

我的这种调侃对邻居的老头太太们相当有用，他们听了我的幽默后，昏暗的小眼睛开始发亮，连连说：“我这一辈子净做好事儿，从不干坏事儿！”我说：“那太好了，你下一辈子就会生在有钱的人家，享福吧！……”

可我的母亲决不迷信，我的调侃幽默对她无效，她总是阴着脸斥责我是“胡说八道”，为此，我感到母亲的晚年心里肯定是在疑虑和恐惧中煎熬。

第三个阶段，是父母最后的晚年时光，这时你会听到他们说这样的话：“死就死呗，谁还能不死，最好‘嘎嘣’一下死了！……”这时，父母说的绝对是真话，他们对死亡已经“认头”，也不恐惧了。但产生了另外的恐惧，就是对死亡的方式产生恐惧。会怎样的死呢？可别太难受，太痛苦，太遭罪，最好是“嘎嘣”一下死了，那就万事大吉。

坦率地说，父母晚年的三个阶段，一般儿女很难理解。心理学家无论怎样说，怎样解释，怎样清晰地剖析三个阶段的心理变化，一般年轻人听了也白搭，因为这是生命的经验。经验是岁月磨炼的结果，你可以刻苦学习到知识，但无论怎样刻苦也学不到经验。经验不是学来的，而是你必须有一定的经历、一定的挫折、一定的醒悟，才会积累出来，所以当你们到了父母的年龄，就会懊悔当年对父母缺乏细致的理解并误解。一代一代的代沟，不得不反复重演，无法跨越。

我的一个老朋友突然嘴里发苦，吃什么东西都苦。他有些恐惧，觉得自己是得了什么大病的征兆。这时他想起他母亲晚年有时在他面前说：“嘴巴苦巴巴的，吃什么也没滋味儿……”他当时没当一回事儿，听母亲唠叨多了，就不耐烦地说：“吃甜的就不苦了！”如今他嘴里发苦，但喝蜂蜜也照样发苦，他这才明白，人老了，植物神经紊乱，免疫力下降，有时会莫名其妙地出现这疼那疼的怪症状，不能及时排除上火(炎症)。身体只出现异常，老人立即就会联想到“死”这个字眼儿。因此就在儿女面前唠叨，而儿女总当耳旁风，这就使父母长久地吞咽着心理的恐惧。老朋友现在的恐惧，儿女们就笑他不是有点“神经”了。

都说老人是老小孩，有着小孩的乖巧，但这个乖巧中夹杂着怪异。老人们真老糊涂也装老糊涂，年轻话反说，声东击西，旁敲侧击”。年轻人有心却很难有细心。所以善待父母、孝敬父母并不够，没有深刻的理解，不能“对症下药”，往往好心好意也会矛盾重重。

当然，有钱的父母、有文化的父母、思想单纯的父母，不会有这样“复杂的心绪”，那你就别把我这篇文章当回事儿。

尊重一棵流浪树

□罗建华

红十字会医院对面的街心小花园，收留了一棵流浪树，给了它尊贵的地位，篮球场大的面积都是它的领地，一树挺拔，独领风骚。

这棵流浪树懂得回报，一点不辜负厚爱，高大在十米以上，均匀伸展六米枝干，撑开一辆自行车绿伞，呈现对称之美。

站在树下往上看，伞的纵深和弧度也恰到好处，全然一个蒙古包的穹顶。大枝、分枝、小枝、细枝交错相叠而上，站好了各自的位置，一层层叶子梳理成章浓密覆盖，编织得密密实实，只怕纺织女工中的劳模级人物，才有这等心灵手巧。打小接触过《知识就是力量》杂志，见过仿生学文章说，体育馆大顶借鉴过荷叶，那么博览会大厅可以学学这棵树了，它神奇得有工业标准的韵味。

这棵树名构树，为什么叫构树？因为擅长构造吗？五笔字型都敲不出它的词组，因为是野生流浪吗？

构树识得早，玩球时代到张公堤外钓青蛙网蜻蜓，田头地角埂塘边猪圈茅厕随处可见，听人骂它“生得贱”。小伙伴在野地拉屎，揪它厚实的叶子揩屁股，皱褶处渗出乳汁一样的液体沾手，又听人说这叶子能喂猪。

构树生命力特顽强，院后门前冷不丁也来一蓬，顽强得有些令人讨厌。它太会抢地盘了，拼命挤兑各种的树和花草，长势还特别旺，“野火烧不尽”一样蔓延。只能怪天风，风干啥要到处刮呢？构树的种子，从来没见过它啥样子，可落地就抖出嫩茎细叶，宣示它的到来它的存在。

街心小花园几乎天天路过，从未注意到这棵流浪树，不知它哪一年落户，竟未被花工清除；也不知它咋地长这么大的，得到花工的呵护。佩服它聪明勇敢又挺争气，出落得这般像模像样，告诉我们有充分理由占据一席。

构树呀，芸芸众生，草根一族，命比纸薄，鲜有这等好运气。街心花园不远的银行大楼侧门，紧挨铁栅栏有过一棵——正是紧挨铁栅栏，不那么碍事，砍掉还费事，得以幸存下来。它也是想活得有价值，主干斜钻出铁栅栏，探身到人行道，树冠优美如盛开大蘑菇，吸引了俊男俊女来拍照。万物只要活出美来，不见得要什么特别功效，悦人身心就是价值，如同北岛的“橘子辉煌，一颗星星刹住车，照亮了我”。

大家经常学他说话、逗乐。父亲也不在意，总是一笑而过。因他经常去镇上的办事，帮别人捎点东西也是常有的事。有时候镇上的拖拉机坏了，要配活塞什么的，他也乐意跑路，骑着自行车去帮着买。有一次，有个同村的人说去相亲，路有点远，想要借用他的自行车。

那时候，自行车少，比较值钱，一般人家买不起。父亲的自行车是单位配发的，他非常爱惜。父亲每次回家，我都自告奋勇地帮他擦车，用扳手紧紧小螺帽。父亲也乐呵呵地说，老大很有本事呢，长大了肯定能当“gun(工)程师”。

其实，我不知道工程师是干啥的，我只想学骑自行车。他却总是说，等你长到跟我肩膀一样高时再学，你现在还小呢。我知道，他担心我会把车弄坏。

所以，这次别人借自行车，他确实犯了难。母亲也不赞成，说这人办事毛毛躁躁，不靠谱。父亲犹豫了一阵子，还是借给人家了。后来，自行车果然被弄坏了。那人车技不行，连人带车摔下了桥。车砸坏了，人也摔成了骨折。

还车的是那借车人的父亲。还车人一个劲儿地表示歉意，又骂他儿子不听话，跟我父亲添了大麻烦，但就是只字没提赔钱修车的事儿。

父亲听了老人一席话，心里一软，反倒安慰起对方，修车钱的事自然没谈。还车人走了，父亲开始发愁。说这修车的开支有点大，又不能全让单位报销，只好自己吃点亏。

为这事儿，母亲数落了他好几次，说他就是心善，当好人，吃闷亏。父亲却解释道，你看别人都摔伤了，伤筋骨一百天，人家治病也还要花不少钱呢。

父亲的身板很结实，身高一米七二，长得浓眉大眼，筋壮骨力。我母亲身体比较单薄，父亲很心疼母亲，从来不让她干重活。我十二岁那年，农村实行包产到户，我家分得三亩多责任田。望着我们姐弟三个小不点，母亲面露难色。父亲却大手一挥，说，有我们三个男子汉，怕什么！然后就一边下田劳动，一边教我和十岁的弟弟干简单的农活。他常说，妈妈和姐姐是女人，就当我们的后勤队长。我们是男子汉，有的是力气，十二甘罗为宰相呢。实际上，我和弟弟开始时也只能帮他打打下手，重活累活都是父亲一人包了。有时候，我和弟弟嫌累不想干了，他就说：“不怕慢，就怕站；站一站，二里半。”

寒来暑往，春耕夏耘秋收，多数农活我都学得像模像样，地也种得有模有样。现在，虽然我已很多年不种地了，但人勤地不懒的道理却早已刻在了我的内心深处。

岁月不居。一晃，我们姐弟仨都先后参加工作，成了家。母亲依然在村小学教书，父亲也还是家里单位两头跑。在我的印象中，父亲还是那么精神抖擞的。在我跟妻子筹备婚事时，舅弟见到了我父亲，他悄悄地问我妻子：“姐夫长得怎么不像他老爸？”言下之意，说我赶不上父亲的俊朗。父亲他也常说，“我这身体，活个八九十岁没问题，你们只管兢兢业业地把工作干好，不用为我操心”。

确实，父亲很少生病，更没有住过医院。但毕竟是五大几的人了，我偶尔也感觉他老了，白发悄然增多，精力也有所不济。有时候，我们一家人围着炭盆烤火，说着说着话，他就睡着了。

有一天夜里，我连续做了两个梦，一生一死。梦见弟媳生了儿子；又梦见父亲去世了。梦把我惊醒，出了一身汗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把做的梦讲给妻子听。她说，好梦。为什么呢？梦是反的，梦死得活。她还开玩笑，说，姐姐和我们都是生的儿子，看来弟弟他们要生女儿了。老爸呢，身体好，肯定是高寿。

我也深以为然。时间大约过了两个月，有天晚饭时分，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，是父亲的同事打来的。说他中了风，人已住进了镇卫生院。我慌忙从县城出发，赶到父亲工作所在乡镇的卫生院。

父亲躺在病床上，非常憔悴。他的半边身体已不听使唤，但他总是想翻身，想起床，要我扶他上厕所。这也难怪。我记忆中的父亲，是很干净很整洁的人。他的衣服总是洗得干干净净，叠得平平整整。每件衣服，哪怕穿了很多年，洗得发白了也舍不得扔掉，且穿在他的身上，还非常得体，清清爽爽。

但现在，他已不能，拉裤都在床边。因此，他显得特别烦躁。

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。我望着病中的父亲，想着他往日来去匆匆的样子，感受着人生的无常。

父亲在住院期间，有很多乡亲跑了很远的路，来医院看望他。我记得有两位八十来岁的老人，是一对老夫妻。两老是步行了大半天才来到医院的。老人坐在父亲的床边，摸着他的手，喃喃地说：“都说你是好人呢，好人是好报的。”

那时，父亲的身体已极度虚弱，十来天没吃东西，原本结实的身板，瘦得只剩皮包骨。

“好人命不长啊……”

父亲模模糊糊回了这句话，也是我听他说的最后一句完整的话。

随后，父亲陷入了昏迷，鼾声很大，在卫生院的大门口都能隐约听到。

父亲住院十二天后，静静地走了，宛如一片随风飘零的秋叶。

他入院时，正值初春，乍暖还寒。但眼下，病房外的玉兰花已次第盛开，开得很喧闹，它们对我的心境，全然不予理会。

三个多月后，弟媳果真生了个男娃儿。我那晚的梦，都成了现实。

从那以后，我就害怕做梦。

父亲走后，我经常会一个人发呆，回想他对我们的点点滴滴。我深深地体会到，他是爱我们的，他也满带着善意，善待他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个人。他教我做人要诚实，做事要有恒。要与人为善，上半夜想想自己，下半夜也想想别人。他是一个好人，他应该活得更好。

现在，我的儿子已经长大，长成了一个高高大大、阳光上进的帅小伙。在他的举手投足之间，与我印象中的父亲很有几分神似。



□向北

远去的父亲

父亲离开我们已快三十年了。他去世时，我儿子出生刚满三个月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总想写一点关于他的文字，却又似乎不知从何写起。时至今日，仍然没有写下只言片语。每每念及此事，心中顿生愧疚，让我寝食难安。

前几天，在家整理老照片，找来找去，竟然找不到一张我与父亲的合照。

父亲的形象，在我的印象中，有时候清晰，有时候是模糊的。单是父亲的身世，就是谜一样的。

从我记事时起，就没有见过我的祖父祖母，我好像也没有叔叔或伯伯。大概是在我五六岁的时候，家里来了一位陌生老头儿，在与我们一起吃完了晚饭后，却没有马上告辞的意思。母亲收拾完了餐桌上的碗筷，又开始整理厨房的杂物。

那时候，我们家在农村，住的是两间半茅草房，一间作堂屋，一间是全家人的卧室，还有半间房是厨房。母亲把厨房收拾了一下，腾出一块空间，用碗柜隔开，又用板凳和门板在角落里支了张床，那老头儿便住了下来。

母亲让我把那老头儿叫爷爷，我没叫，只是怯生生地望着他。

老头儿剃着光头，眼睛凹下去，很有神，好像一眼就可以洞穿我的心思。他的嘴唇有点外突，有稀稀拉拉的花白短胡子。他讲话有很浓的外地口音，有些字的发音，与父亲类似，但也不完全，我有时候听不懂。

老头儿看起来有点儿喜欢我。他牵过我的手，把我抱坐在他的膝盖上，有一次还教我画过画，好像画的是鸟儿。住了一阵子，老头儿似乎有些不习惯，我隐隐约约地听他跟父亲抱怨，说没人陪他玩牌，喝酒也没有对子。

母亲问父亲：“什么是对子？”父亲说：“就是陪客，他说一个人喝闷酒，没得啥意思。”

不久，那老头儿反复说住不习惯，坚持要回老家。有一天，父亲起了个大早，就把老头儿送回去了。好像去的地方很远很远，母亲说要好几条河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再也没见过那老头儿。

我上初中以后，方才知道，那老头儿是父亲的养父。我上初二那年，家里收到一份电报，说父亲的养父得了重病。父亲和母亲一起赶去探望。

不久，老人就去世了。在弥留之际，老人断断续续讲了一些事情，父亲也是在那个时候，才大知道了自己的身世。父亲的亲生父亲是四川人，姓黄，是川军的一个下级军官。那年，川军出川抗日，在通海口的一次战斗中，祖父阵亡了，只留下祖母和我年幼的父亲。

孤儿寡母，流落异乡，无依无靠。祖母别无选择，只得改嫁。不久，祖母又难产，撒手人寰，父亲就成了孤儿。据说，祖母去世时，还留下了些许金银细软，但大多被父亲的养父换了酒，或是赌钱输了。这都是邻居们悄悄告诉父亲的。

后来，我父亲母亲也曾多次商量，打算入川寻亲，但受限于地址本身不详，加上时过境迁，路途遥远，只得作罢。前后也写了几封寻亲信，但都杳无音信。现在，我父亲也去世了，他的身世，也就彻底成了一个谜。

可想而知，父亲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一定满是困苦，备尝艰辛。

在我们小的时候，也曾听父亲给我们讲过他的经历。那时候，我们不谙世事，只是当别人的故事来听。父亲成年以后，做过工人，参加过武汉长江大桥的修建。他又当过兵，家里有好些父亲和战友们的戎装照。父亲还曾教我们唱过部队里的歌，“嘿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天空出彩霞呀，地上开红花……”他一边唱，一边挥手打拍子，音犹在耳，恍如昨日。

从部队转业后，父亲被分配到农业银行的一个乡镇营业所工作。后来，他认识了我母亲，就有了我们仨姐弟。

在父亲艰难曲折的人生旅程中，我的降生，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快乐。我出生在农历六月二十四日。听母亲说，那年的夏天很热，热得出奇。父亲当时工作的营业所，离家很远，交通十分不便，在往返的途中必须坐船，渡过一条很宽的河。

家里托人去给父亲报信，当他得知我出生的消息时，已是傍晚。父亲赶紧慢赶，赶到河边时，天已黑了，船工早就收了渡，喊也没喊应。父亲的水性很好，于是他决定，游过那条河。

那该是怎样的一个夏夜啊！一位年轻力壮、血气方刚的父亲，为了尽快见到他刚刚生产的妻子，见到他呱呱坠地的儿子，他不顾一切，跳进那宽阔的河水之中，奋力振臂，击水前行。

哗，哗，哗……身边浪花飞溅……扑，扑，扑……时而惊醒夜宿的野鸟……

天空中，明月清朗；河面上，波光粼粼。

划啊划，划啊划，近了，近了，彼岸就在眼前……

我曾无数次想象这样一幅绝美的画面。

但我知道，那一晚，没有月亮。

在我儿时的记忆中，父亲经常骑一辆载重自行车。记得有一次，父亲把我带到他工作的地方去玩。在白天的时候，我还玩得好好的，天快要睡觉了，我哇哇大哭，到处找母亲。父亲后来回忆说，我那时就像一只小猫，拼命地叫，怎么哄也哄不住。他只好连夜骑着自行车，翻山越岭，把我送回家。

我家是“半边户”。母亲是村里民办教师，父亲在家里和单位之间两头跑。父亲回家，我们姐弟几个盼星星，时而又有点小小的害怕。

先说盼望。那是一种美好的感觉，是一种令人羡慕的期待。大多数情况下，父亲的回家，我们仨姐弟是快乐的。父亲，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搬运工。他离家时，自行车的后架上总夹着一个空麻袋。过几天后，父亲又回来了，自行车的后架上驮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麻包。父亲快到家门口时，自行车“叮当叮当”的铃声便欢快地响起来。我们闻声而动，迎着铃声飞奔过去，把父亲和他的自行车团团围住，欢呼雀跃。

我们齐心协力，帮助父亲把自行车的站架支稳停好，然后急不可耐地卸下笨重的麻包，解开扎口的细绳。麻包敞开了口，我们的小脑袋争先恐后地探过去，急切地想知道，父亲又给我们带回了什么好东西。

麻包里变幻着魔术：有时候是金黄的橘子，有时候是青皮的鸭梨，还有花生、板栗。看着这些好吃的东西，我们口水直流，也让隔壁家的小孩子非常羡慕。

这时候，母亲就会走过来，先挑一点，送给邻家的小孩。然后，把这些东西分成三份。弟弟最小，分得最多。姐姐舍不得吃，常常把分得的水果、板栗之类的东西，放在木屋里攒着。

经常是这样，等过了几天，当姐姐想起未吃的东西时，抽屉里已是空空如也，再也寻不着了。母亲就问弟弟：“又是你偷吃了？”并装出要打他的样子。弟弟就快跑几步，躲开母亲，调皮地做起鬼脸。

再说那害怕的情形。我们姐弟三个，时常也闹点小别扭，有时候这个闹，那个哭，弄得母亲有点心烦。往往这时候，母亲那借口头痛又来了：“让你们闹，让你们闹，等你爸爸回来了，看他怎么收拾你们。”

于是，我们就会老老实实地安静下来，心里盘算着，父亲还有几日会回来，还希望他有事缠身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

过几日，父亲终于回来了。有时候，母亲好像忘了那些烦心事儿，没跟父亲提起，让我们暂时舒了一口气。有时候，母亲也向父亲提起，父亲也只是简单地训导我们几句，事情也就过去了，并没有打我们。

唯有一次，父亲真的动了怒，他使劲儿拧了我的耳朵，差点拧出血来。那一次，是因为我撒了谎。记得我家菜园里有一畦田，母亲种了些甘蔗。我经常溜进菜园里，摸那些粗细不一的茎秆，甘蔗的青皮上有一些白粉，宽宽的叶子上有锯齿，曾划破过我的手，很疼，还沁出了一些血。我始终惦记着那些甘蔗，经常想象甘蔗的甜味，是像砂糖那种甜呢，还是像脆瓜那种甜呢？母亲几次三番地跟我谈，说甘蔗的季节还没到，要等打了霜，甘蔗才会甜。

甘蔗是甘蔗，霜是霜，甘蔗甜不甜，与霜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想，母亲一定是在骗我。

一天，趁母亲不在家，我偷偷在菜园里砍了一根甘蔗，还用泥土把地里甘蔗的根部埋上，让人看不出偷砍的痕迹。在我偷砍甘蔗的时候，被母亲发现了，板着脸问我，甘蔗是从哪儿弄来的。我怕母亲生气，就撒谎，说是别人送的。母亲又追问，是谁送的？我继续撒谎，是蛮远蛮远的人送的。母亲更生气了，说，不管有多远，我们今天都要找到给甘蔗的人。

我只得承认，是从自家菜园里砍的。母亲气得脸发红，说不出话来。我没有哭，但母亲哭了。她是担心我偷了别人家的甘蔗，她快急死了。

不久，父亲回来了。母亲这次没有忘记，原原本本地将我偷砍甘蔗还撒谎的事儿告诉了父亲。这一次，我是真正看到了父亲生气的样子。他跟我说话的声音特别大，准确地讲，不是说，而是吼，就像暴雨天里打的炸雷。直到今天，我摸摸耳朵，都似乎还在隐隐作痛，那如雷的声音还在耳边回响，提醒我，做人要诚实，不得撒谎。

父亲是个热心快肠的人，人缘很好。村里无论大人小孩儿，都爱与他说话。父亲是外地口音，把“黄豆”说成“环豆”，把“扎账”讲成“扎站”，引得